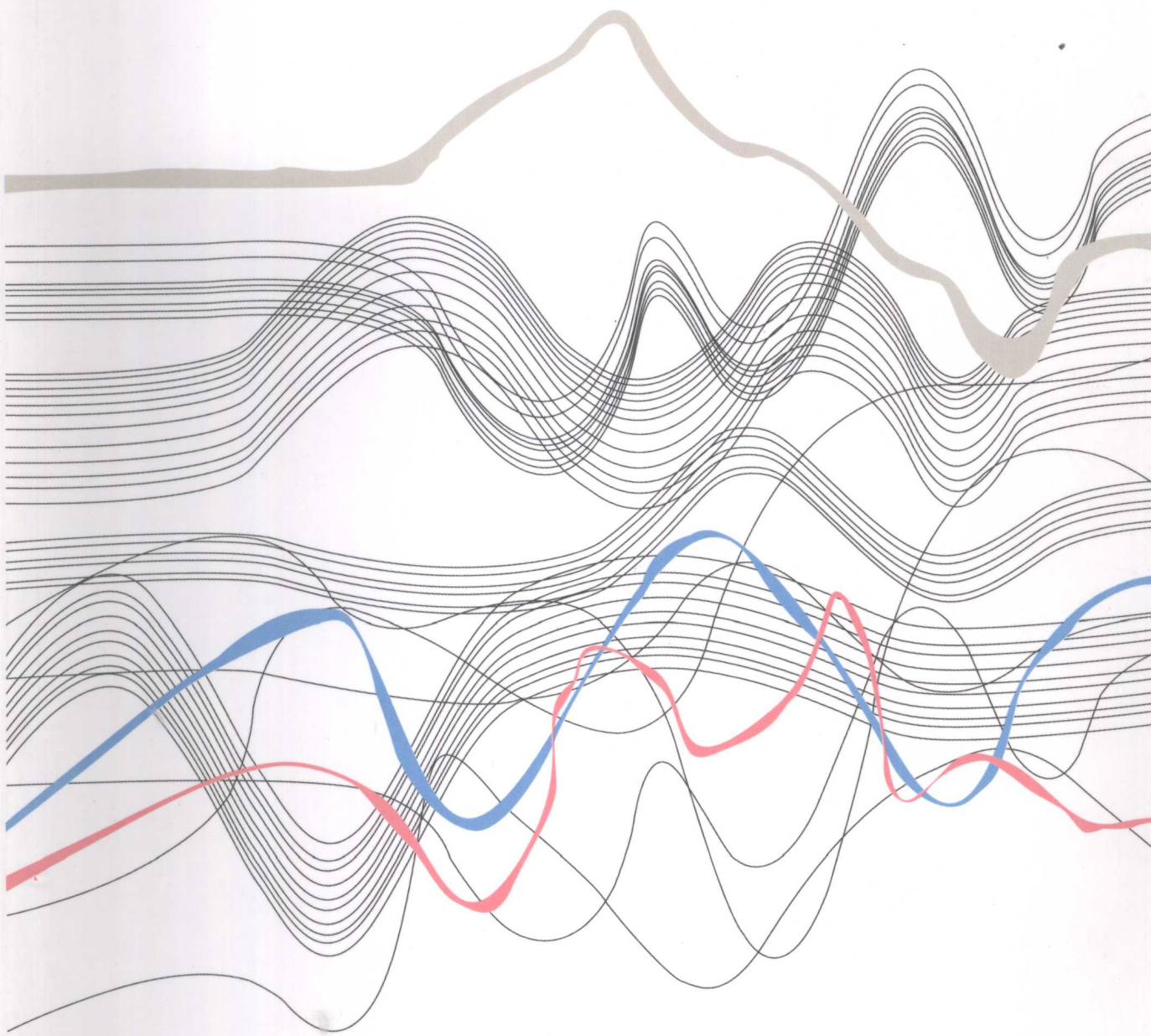


传播特色研究

——经济新闻·广告经营管理理论集

沈 毅 林 刚 罗子明 等著



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美术出版社

传播特色研究

CHUANBO TESE YANJIU

——经济新闻·广告经营管理论集

JINGJI XINWEN GUANGGAO JINGYING GUANLI LUNJI

沈毅 林刚 罗子明等著

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特色研究:经济新闻、广告经营管理论集/沈毅
等著.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14-3950-9

I. 传… II. 沈… III. ①经济—新闻工作—文集 ②广告
学—传播学—文集 IV. F 713.80-53 G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4688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30千字
出版时间: 2007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申 薛 丽
封面设计: 张东明
版式设计: 李英辉
技术编辑: 鲁 浪 徐 杰 霍 磊
责任校对: 张亚迪
ISBN 978-7-5314-3950-9

定 价: 29.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pgc.com.cn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4688号
辽宁美术出版社

编写说明

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在国内率先确立了“传播聚焦经济，艺术服务市场”的办学理念。学院的新闻学专业早在1997年设立新闻专业之初就确立了经济新闻的特色方向，广告学专业则在1993年确立了广告经营管理的特色方向。学院教师多年来进行了积极而有成效的教学科研工作，不断把这一办学理念落到实处，专业特色方向建设也不断向前推进。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合格专业人才，在我国传媒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相继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闻与广告传播》、《经济报道与品牌传播》、《传播聚焦经济：市场·运作·历史》及《传媒：经济运作·信息传播·话语语境》。这四本书中的多数论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在经济新闻、广告经营管理研究领域的成果。

本书是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教师在经济新闻、广告经营管理等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收入本书的论文共计48篇。1.属于新闻专业范畴的约20篇，研究的对象包括：经济新闻史，如维新变法运动中资产阶级报刊的经济报道、30年代知识界比较著名的杂志《独立评论》农村问题时评、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报道；传媒产业，如广播电视和网络产业、播客和电视纪录片、媒介效果、民营传媒业，以及奥运背景下的北京传媒业的国际化等。2.属于广告专业范畴的10余篇，研究的对象包括：国内广告人，如国内广告人误区；新媒体广告，如网络广告与手机广告；广告与消费的良性关系，如广告与消费的和谐；品牌，如国家品牌形象与国家形象，等等。此外，本书也收入了本院从事文学教研工作的教师的有关学术论文，如对鲁迅、巴金、屈原等文学家及对古诗、女性主义等问题的剖析。

编者

目录

《独立评论》拯救农村破产方案研究 / 沈毅	7
《独立评论》农村问题时评研究 / 沈毅	11
首都民营传媒产业发展前景分析及政策建议 / 王擎	18
首都网络媒体产业发展综述 / 王擎	23
电视与消费社会建构 / 吴玉玲	28
广播电视产业规制与变化——以美国为例 / 吴玉玲	33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经济新闻报道的探索与反思 / 范敏	38
中层理论与媒介效果研究的范式转变 / 范敏	44
对“真实再现”手法使用的探讨 / 许莉	50
央视主持人大赛的功能分析 / 许莉	55
《奥普拉·温弗莉访谈》的节目风格分析 / 连少英	60
浅谈电视纪录片的纪实性特征 / 连少英	64
大众传媒时代, 如何理解“媒介审判” / 路鹃	67
论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中经济新闻报道的特色 / 路鹃	72
播客文本的“自我实现”意义 / 汤莉萍	78
移动播客磨平数字鸿沟 / 汤莉萍	82
试析国内广告人的种种误区 / 罗子明	87
浅析媒体资本竞相角逐户外媒体市场的原因 / 张翔	91
对广告与消费和谐的思考 / 徐小娟	94
重视意见领袖在广告传播中的作用 / 徐小娟	98
我国网络广告市场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 高丽华	102
国家品牌形象与国家形象广告 / 许之敏	109
“首都之窗”网站新媒体广告分析 / 许之敏	116
数字电视技术在新媒体的应用 / 李岭	121
烟草广告 路在何方 / 赵妍妍	128

探路手机媒体与手机广告 / 赵妍妍	133
从独树一帜到更上层楼: 谈两代领导人对新加坡今日报业格局的影响 / 公克迪	138
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分析 / 张春萍	144
浅析品牌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 / 王富军	150
奥运中国与北京传媒产业的国际化 / 林刚	154
因革与衍变: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的传播 / 林刚	160
毕淑敏小说中对孕育主题的另类思考与表达 / 王新惠	166
王家平先生鲁迅研究综述 / 王新惠	170
浅析申论考试的基本特点和命题形式 / 夏京春	174
试论鲁迅《野草》的艺术特色 / 夏京春	179
暗流中的困兽之斗	
——浅论《雷雨》中的繁漪形象 / 袁钟芳	183
浅谈巴金的生活与艺术创作 / 袁钟芳	188
《春来冬去》: 禅与诗的镜像表达 / 杨柳	194
透视《金锁记》电视剧的改编 / 杨柳	198
20 世纪汉乐府研究历程 / 赵明正	202
“史公三失”的现代诠释 / 赵明正	207
和而不同	
——女性主义理论在中西文本中的个案分析 / 刘莉	212
审美语境的类型分析 / 刘莉	216
西方文学作品中“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 李倩	221
《傲慢与偏见》中女性群像的爱情观 / 李倩	225
论大学语文的人文教育 / 黄昌莉	230
从《九章·哀郢》看屈原的人格精神 / 黄昌莉	234
试论当代师生伦理的三境界 / 杨旻	238

《独立评论》拯救农村破产方案研究

沈毅（1954—），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摘要：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的时评，针对农村破产，提出了包括减轻农民负担在内的“无为”以及控制人口数量、增加农民收入、变革土地制度、积极救灾和开展农村合作事业等“有为”的主张。这些主张不少是有积极意义的，反映了作者对农村的关注和思考。但基于改良主义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键词：《独立评论》；拯救农村破产方案；胡适

胡适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媒体。在该周刊所刊载的文章中，对当时农村存在的严重危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文章比较清醒和准确地注意到导致农村破产的诸种因素，如当局对农村杀鸡取卵般地勒索、基层官吏明目张胆地鱼肉人民，以及人口过多、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城市工商业落后等。该杂志在比较全面地剖析农村破产的现象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村破产的方案。本文对其拯救农村破产方案进行一些粗浅的探索，敬请大方之家教正。

一、拯救农村破产的构想

《独立评论》并没有满足于仅仅揭示出农村存在的种种危机，它揭示矛盾的目的，在于警示统治者正视问题所在，并尽快改弦更张。基于此，作者们提出了解决农村破产的方案。

第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胡适的主张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救济农村的办法可分为“无为”和“有为”两种，眼下最迫切的是“无为”，即“除弊”，包括“裁减官吏与机关”（即“裁官”）、“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事业’”（即“省事”）、“努力裁兵”。他说：“救济农村必须赶紧努力做到减轻正税和免除一切苛捐杂税；而减除捐税必须从裁官、省事、裁兵三事下手”。^[1]

第二，开展各种积极的、切实可行的“有为”举措，也即胡适称之为的“兴利”。在这方面许多专家都提出了较有价值的主张。概括地说，包括：

控制人口数量。巫宝三认为“节制生育则是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的最后武器”。他也认识到改变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艰巨性，但他认为“现在政府及所有乡村工作机构，都应该竭力，至少是与其他工作并重的，宣传及推行戒除早婚与节制生育这两件事。”他说，他在定县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曾建议乡村合作社订立共同信条以戒除早婚与节制生育两事为其信条之一”，并承会议采纳。他认为既然合作社“在乡村中已经散布相当的广”，因此完全可以利用合作社来宣传、教育和推广戒除早婚与节制生育。^[2]吴景超呼吁：“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巨大人口数量。……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3]

增加农民收入。董时进认为：挽救农村破产的办法，除了停止压榨农民外，“当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为最重要”。增加农民收入可通过技术和经济两种方法，技术方法就是靠改良农业来提高产量，经济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城市工商业使农民获得双重利益：农产品价格可以提高，水果、鸡蛋、牛奶等产品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而此类产品的生产又最需工时，从而使多余的农民劳力有了释放的地方；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多余人口，增加劳动者的购买能力。^[4]《独立评论》上还发表有多篇文章，如《农业教育与改良农业》（一）、（二）等，探讨如何改善农林教育，以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变革土地制度。吴景超主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有立即施行的必要。”作者的具体方案是：效法丹麦的方式，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政府效法爱尔兰的办法进行减租，以便促使地主售地；借鉴东欧各国的办法，政府规定土地价格，以限制地主囤积土地；购地之款，应由政府全部借与农民；政府筹款的方式，或由政府举债，或由政府发给地主土地债券。^[5]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当然有理由批评作者的主张不够彻底，是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但作者在当时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对中外土地制度进行严肃的对比和考察，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所提出的主张对改善农民处境来说也不失为一种选项。

积极的救灾。章元善在《国难中的救灾问题》一文中，比较细致地分析、论述了救灾与拯救农村的关系。他认为救灾可以有上策、中策、下策三个选项，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救灾的上策即平时努力，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既免去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无需赈灾开支。救灾的中策，虽然属于“临时抱佛脚”，“成灾之后，利用赈款来办建设事业，以工代赈，大兴土木，召用灾民做工，使他们可以得到工资，以之养家活口，完成‘赈’的目的。做出来的工程，可以帮助他们将来的生产，一钱两用，还算是上算。”所谓救灾的下策，就是在灾害发生后被动地“设收容所、安粥锅”，“只晓得死守陈法来做挖肉补疮的工作。放粥之后，跟着就要施棺抬埋。”他批评多年来被动地实行着救灾的下策，同时他希望今后实施积极的上策，“最低限度亦应力行‘中策’”。^[6]章元善曾长期从事慈善赈灾事业，对中国灾荒的原因及救灾工作的得失是很了解的。其救灾的上、中、下三策是很有针对性的经验之谈。

推广农村合作事业。章元善在1933年的《皖赣农赈》文章中介绍了华洋义赈会赈济安徽、江西水灾时组织农民合作赈灾的做法：凡是要得到农赈的农民，必须组织互助社。互助社获得农赈

款后的用途，一是共借共用，如用于修堤工程；二是共借分用，即互助社分给社员自由使用，如购买种子。农赈结束后，华洋义赈会通过办讲习所继续宣传合作理论与实施办法，并办《合作讯附刊》月刊进行散发。章元善感慨：“中国农民富有合作的情绪，他们都是诚实无欺的良民……略加训练，他们亦有组织的能力。”^[7]1934年章元善发表《从定县回来》，再次强调办好合作社对于振兴农村的重要性。他说，河北省定县的合作社虽有一定的基础，但还只是偏重于“购买”即“消费”上。他认为定县仅靠各村的平教会同学会是难以搞好农村新事业的，只有合作社才是“平教运动的生命线”，要“以经济的组织——合作社——为中心发展村治”。^[8]巫宝三在1934年发表的《定县主义论》一文中也认为，定县开展各种农业改良事业，并非一定要靠识字运动，“合作社即能代替之。合作社的组织，直接代表农民的经济利益，在组织上比较简捷。”“若是办理得法，则许多方面应兴应革之举……所谓文字教育……即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亦可藉此组织以实现。”^[9]

二、对当局的劝诫与警告

《独立评论》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时，一些文章带着激愤，措辞是比较严厉的。胡适在《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中用官逼民反的现实敲打国民党：“在这样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10]《复兴农村与农民负担》的作者在考察了并无天灾而百姓却面临绝境的陕西省南郑县后疾呼：“地方财政，苛捐杂税的治本治标，不是没有办法。要是政府在讳疾忌医，空谈延误，那么经济的破产，社会的崩溃，又岂止限于农村呢。”^[11]1935年的《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上）提醒当政者应该了解“农民的不信仰政府和官吏”，原因在于政府自绝于农民，“多年的继续不断，层出不穷的种种虐政，各种官吏，尤其是与农民直接有关系之县长及其所属人员的贪污，以及种种不兑现之冠冕堂皇的宣言，标语和口号，已经早把老百姓对于政府，尤其是县政府的信仰失掉了。今后任何政府，想要取得民众的信仰，非以事实证明不可，此外别无他法；告示上的‘与民更始’和口头上的‘救民大计’，再也不能打动老百姓的心了，再也不能发生效力了。”^[12]《民间疾苦》的作者历数了当政者的弊政后，在文章末尾引用了清代道咸年间诗人李西沪的诗《贼来犹可》：“贼来犹可，官来杀我，贼犹可避官难躲。……同然为暴客，官更残于贼，治贼不治官，贼竟何由灭。呜呼，世愈乱，官愈劣，贼不灭，人且绝！”^[13]作者意在警告当政者注意民心的向背。

三、《独立评论》时评的特点

中国农村问题由来已久，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格外引起社会重视，“复兴农村”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历史环境下农村危机更形严重，另一方面就在于包括《独立评论》在内的舆论界的疾声呼吁。从揭露问题的尖锐程度、分析问题的深刻程度以及作者的学术社会地位等方面看，《独立评论》有关农村问题时评在当时传媒界的地位都是非常特殊的。《大公

报》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其“星期日论文”专栏在当时与《独立评论》时评相呼应，都有很好的社会反响，但《独立评论》的特点更为突出。从时间上看，《大公报》的“星期日论文”创刊于1934年，而《独立评论》1932年创办后的第2号上就刊载了有关文章。《大公报》的“星期日论文”栏目是胡适建议设立的，作为《独立评论》主编的胡适还为“星期日论文”撰写文章。《独立评论》对《大公报》的影响可见一斑。当年办《独立评论》的初衷，就是胡适、翁文灏等人基于内忧外患，“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14]办刊的实践证明创办人信守了承诺，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独立评论》有关农村问题文章的观点当然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甚至批评的地方，但在当时对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村问题，起到了促进思考、深化认识的积极作用。其国情观、农情观，特别是关于人口数量、土地制度、无为与有为关系、土地规模经营、城乡关系互动、农村多余人口的出路、农村合作等问题认识，在当时的媒体中算是比较早和比较系统的。今天读起来也难免不让人感叹作者认识的严谨与超前。这样的认识对后来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无疑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和学风。当然，总体倾向上，《独立评论》上的有关拯救农村破产的文章，还基于对旧制度的修补，是改良主义的，而历史进程已经证明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注 释

- [1] 胡 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第3页。
- [2] 巫宝三：《乡村人口问题》，《独立评论》，第134号，第11—12页。
- [3] 吴景超：《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独立评论》，第155号，第14页。
- [4] 董时进：《论复兴农村》，《独立评论》，第56号，第10页。
- [5] 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独立评论》，第165号，第6页。
- [6] 章元善：《国难中的救灾问题》，《独立评论》，第12号，第18—21页。
- [7] 章元善：《皖赣农赈》，《独立评论》，第44号，第11—16页。
- [8] 章元善：《从定县回来》，《独立评论》，第95号，第8页。
- [9] 巫宝三：《定县主义论》，《独立评论》，第96号，第9页。
- [10] 胡 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第2页。
- [11] 守 愚：《复兴农村与农民负担》，《独立评论》，第66号，第10页。
- [12] 李景汉：《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上），《独立评论》，第179号，第10页。
- [13] 叔 永：《“民间疾苦”》，《独立评论》，第31号，第9页。
- [14] 胡 适：《胡适全集》，第1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独立评论》农村问题时评研究

沈毅(1954—),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摘要: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有关农村问题的时评数量较多,题材也比较广泛,现实针对性较强。时评比较全面和符合实际地指出了官府无度的勒索、官吏与军阀的贪鄙、土地问题及人口过多等是导致农村危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独立评论》;农村问题;时评;农村破产;复兴农村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朝野把严重的农村危机称为“农村破产”,也试图予以改变,即“复兴农村”。由胡适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媒体中的一份重要周刊,在其关注的众多领域中,农村问题应该算作核心焦点之一。历史学界和新闻学界对《独立评论》农村问题时评的研究差不多是一片空白,笔者愿意对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索。

一、《独立评论》农村问题时评的特点

《独立评论》上的有关农村问题时评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在该杂志存世的1932—1937年的5年间,共发行了244期。据粗略统计,在总计1200余篇文章中,有关农村问题的文章(包括专论和综合类文章中涉及农村问题的),总数当超过百余篇。当年《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类,农村问题只作为经济问题的一部分,能有如此多的文章论及,既说明当年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独立评论》对农村问题的重视程度。《独立评论》上的有关农村问题文章的题材也是比较广泛的。有的是探讨中国农业资源及其利用的,有的是揭示农村存在的具体问题的,也有的是讨论解决农村问题对策的。《独立评论》有关农村问题的文章切入点则表现出多样性。有的理论性较强,对经济现象提出较新的看法;有的是作者经实地走访、观察、调查之后写出的,有较多对现实生活细节的记述和描写,材料是第一手的。杂志上也发表过介绍国外农业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多数都是当时学界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经济学家,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地

质学家,也有少数属于当时没有什么名气的“小人物”。何廉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培刚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李景汉是清华大学教授,被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誉为“国内最能‘深入民间’的社会调查专家,他现在把他在民间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成了一篇很动人的文字。”^[1]地质学家翁文灏、丁文江及经济学家巫宝三等也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不仅发表过多篇文章,还曾在胡适生病时代为主持刊务。胡适在第111号刊物的“后记”中以调侃的口气肯定吴景超的作用:“吴景超先生的好朋友梁实秋先生常说:‘景超是个顶聪明的人,学什么都好,只是不应该去学社会学!’……可是我们每读景超先生文章,总觉得社会学应该是‘学什么都好’的顶聪明的人才配学的。”^[2]在刊物上发表农村问题文章的“小人物”中,有不少是还未毕业的大学生,如《乡音》作者王伏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胡适称“他的这篇文字写得凄惨极了,我们读了很感动。”^[3]其他如山东大学学生徐中玉、北京大学学生张公量、辅仁大学学生董浩等,都发表过有关文章。

杂志上农村问题的文章现实针对性都较强。如“开发西北”曾是当时社会时髦的话题,但却缺少具体的研究者,于是编辑部基于“先研究西北的事实”,发表了《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并基于把开发西北落到实处,发表了《如何开发西北》、《改进西北农业应取之程序》等。针对国民党从上到下高唱“建设”,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胡适发表了呼吁“无为”的若干篇文章。针对当局讳疾忌医及许多民众的虚骄心理,《独立评论》本着反省缺点和“浇冰冷水”的态度,对农村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揭露和剖析,如第117号的编辑后记中胡适所介绍的:“这一期有三篇描写各地人民苦痛的文字,一篇写西南的贵州,一篇写西北的甘肃,一篇写富庶的浙江一县。我们读了这些文字,真有限的感慨。我们盼望各地的朋友给我们写这样文字来。我们不能鼓吹休明,也不配统制文化,只希望做个献《流民图》的郑侠而已。”^[4]有关文章也都比较重视用事实说话,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在该杂志第118号的编辑后记中胡适批评说:“许多少年人每苦于作文没有好材料。其实材料是遍地遍人间都有的,真所谓‘俯拾即是’了。少年人不肯‘俯拾’,偏要‘高攀’;不肯写眼前的生活,偏要搬弄口头的名词来变戏法,所以写不出好文章来。”^[5]署名“寿生”的是一位20岁出头的贵州青年,多次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胡适欣赏地评价他“是亲自做过贵州农家生活,种过稻田和烟田的。他的意见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所以说来最亲切有味,值得政府和舆论界的深切注意。”^[6]

二、《独立评论》对农村危机的概括

1933年的《复兴农村与农民负担》一文,对当时全国农村崩溃的情况是这样概括的:“农村经济的衰落种因于数十年前,农村社会,普遍的崩溃,却是最近几年的现象。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年年缩减,生活年年困苦。内地的省份,偏远的乡村,农民不但有田而不肯耕耘,或耕耘而不敢收获,连房舍都卖掉。甚至昔日的村落,如今只剩破瓦颓墙,房梁屋柱,或卖或烧。数十户的村落,或至人烟绝灭。数百户的农村,或只余十数。这种现象,不

但内地如陕西甘肃河南如此,即安徽山东河北亦是如此。所差别的,只是坏的程度,所大同的,却为一般农民,无论其为大农中农小农田主佃农,都觉困苦若非常,强悍的铤而走险,老弱的坐而待毙。”^[7]让人们对于农村问题严重性有了切身的感受。

以下几段文字为上述概括提供了形象、具体的说明。1932年《独立评论》上刊登了《关中见闻纪要》(下),记述了素称富庶的关中地区旱灾惨相:除极少数地方外,几乎没有不饿死人的村落,在郿县的岐山、扶风、武功一带,“从前一百几十家的‘堡子’,现在只剩了三五家以至十家二十家不等。”旱灾之后又相继出现了狼灾、蝗灾和瘟疫,瘟疫“如一村有一人患病,不到几天,全村都传染起来。所以这次有全家死光了的,全村死去大半的。”关中因瘟疫而死者,“估计有百几十万”。一时活下来的人,不得已只好拆房子卖木料,购买小麦维持生命,而卖一间房子的木料只能买二斗小麦。拆了房子后,只好穴洞而居。小麦吃光后,则吃未成熟的青高粱。在无法活命时,就得卖儿卖女了。一位公安局长告诉作者:从1928年大旱灾时候起,“关中十三岁至三十岁的妇女,卖到河东去的,经山西方面调查,有三万多口。”^[8]《农村经济一夕谭》作者的家乡是山东寿张县的梁山,那里因土地肥沃,原本农民还可维持生计,但“近三四年却也日形凋敝了”。1934年中秋节时他在家乡,伯父因当年收成好,特叫作者去家里吃饭。作者写道:“我去了,只见桌上放了两盘菜,一盘点心,据他说:今年月饼太贵了,可是有点心也满可代替!”伯父家有10口人、两头牛、40余亩地、也算得上村里的中等人家,但吃饭聊天过程中还是连呼“太穷了!”^[9]《乡音》作者的家乡是浙江兰溪县的一个小山村,全村170多户人家,粮食能自给的不过20余户。田租之高,佃农秋收交租后所剩无几。以往农民秋后可到几百里外的深山掘榆树皮,卖给榆粉商,作为一个补偿性的副业,谓之“出门”。“出门”需要少量的盘缠,可农村凋敝,现金缺乏,农民往往借不到“出门”所需的钱。加上榆皮跌价和各地禁止伐木,“出门”这一副业也越来越不好做,“故乡农民的命运,已渐渐的陷入悲惨的深渊!”^[10]《故乡之今昔》作者的家乡是河北井陘县东北的一个村庄,即便以前未陷入破产时,那里的农民的生活消费也是非常之低,“夏秋三餐,冬夏两餐,大米白面肉类非过年过节或婚丧大事亲友到家绝少食用,甚至有终年不知肉味者”。“近两年来,可谓风调雨顺,十成丰收”,但“农村经济破产至不堪言状”。^[11]有人针对四川、陕西民间疾苦撰文说:一向富庶的两省“人民生活状态,简直和残忍的野蛮社会及惨酷的地狱情形不相上下。”^[12]

《独立评论》上还发表了对比城市和乡村生活水平的文章《农村地主与都市贫民》。有趣的是,对比对象是地主和市民。作者的父亲是河北省大名地区的地主,因家乡土匪为害严重,不得已全家搬到城市躲避。他们在城市中租赁了几间房子,与其为邻的三户人家中,“一个是卖水的,一个是建设局的听差,一个是洋车夫”。通过对比,作者深感地主的生活水平比三位城市贫民还低,地主家与三家贫民在“生活程度”上也“相互惊异”。在日常主食构成上,“我们惊异他们的是:他们经常是吃麦子面的馒头,吃棒子面或高粱面的窝窝头是稀有的事。反之,他们惊异我们的是:我们经常地吃棒子面窝窝头,吃麦子面馒头倒反是稀有的事。”作者的妻子很不

平衡地说：“咱街刘财主家有十几顷地，才终年吃白的（指麦子面馒头——自注），他们（指卖水的，洋车夫，听差——自注）没一亩，没一垅的，倒一年一年吃白的。哼！”在副食方面，作者一家“终年月吃着酸臭的咸菜……拿钱买青菜吃用，真有点舍不得。肉类，照例我们不过年节时不用的。”相比之下，三家城市贫民每天或者吃炒菜，“或者用醋哇，香油哇调和着吃。”三家贫民的孩子每天都有零花钱买瓜果零食，而作者对自己的三个孩子“不舍得给他们一个零钱花”。在穿着方面，三家城里人也比这家地主要讲究。地主家与三家贫民最后居然相互“鄙视”：“我们鄙视他们：像牛马一样穷拉车的，给人提便壶的听差，穷卖水的，便这样的吃穿花钱，真是‘穷摆’！看你们能混几天，城市人，没出息的城市人！他们鄙视我们：乡间财主，这样不舍的吃不舍的花，看一个钱像碾盘大，守财奴，活该被土匪抬走！”作者认为大多数城市贫民都在像这三家人那样地生活着，也不排除“有饿着肚子的人”，而乡村地主中的大部分人也和作者一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作者说，他家也并非在做守财奴，“积蓄很多钱埋在地下”。他家有地85亩，9口人，若不想靠卖地来提高生活水平，只能过着这般水平的生活，而且“在大名一带像我们这样的地主在地主中是居大多数呢！”也许作者观察得还不够全面，或许还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观测点，但作者撰文的目的是哭穷，“只是简单地告诉给留心农村问题的人：所谓地主的生活还不如一个城市的贫民，那末，农村中地主之下的自耕农，贫农，中农，雇农，佃农又该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地狱生活呢？”^[13]文章对全面了解农村问题是有意义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提醒读者：作者“王次凡先生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在河北大名的师范学校教过书。他这篇文字写他自己家里的经验，写的十分亲切，很有趣。他提出的问题：‘农村地主的生活还不如都市的贫民’，是值得大家想想的。”^[14]

三、《独立评论》对农村危机原因的剖析

关于农村破产的原因，《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几乎都谈到了自然灾害，但文章也都很清醒地认识到，有些灾害之所以发生并造成较大危害，实际上当政者是难辞其咎的。以中国地域之广，局部发生自然灾害是很正常的，但全国农村普遍贫困，却远非天灾原因所能解释了。1935年张培刚撰文说：“然则近年来灾荒的发生，果真是由于天道反常吗？……我们的回答：这原因全是人为的。”他以水利失修为例：“而到了民国，凡因内战频仍，致固有的水利建设，什九为之破坏或湮没。负治水责任的官吏不能遵守往时的律条，直等人命如儿戏。水灾的迭见，自不足怪。”^[15]章元善1932年撰文说：“天灾的成因，依我看来，只有两项：一是天然势力的失调；一是不良政治的结果。……其实只要低头一想，成灾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老天爷身上去的。在相当限度以内，人力的确可以胜天的。”^[16]还有作者更明确指出：民间疾苦“有十分之八是由于人祸，其中不过十分之一二是由于天灾”。作者发问：“绑票横行的地方，我们叫做匪祸，这样暴官横行的地方，我们叫它做官祸，想来也不是过分罢。”^[17]

关于苛重的捐税，胡适1933年撰文批评说：“现时内地农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

太多，养官太多。……剥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18]1937年的《复兴农村与行政机构》一文批评农村基层机构过多、尤其县下设区的弊端：“县以下分区设署用意原是很好的，但这区署布在农村里，它的对象是农民，如果区长以次不懂得农业，对于农业改良没有浓厚的兴趣，对于农村复兴在我国前途没有深切的认识，他平日在区属所办的事只不过是例行的公文承转”，“反增加了农民的一层压迫。”作者建议区署职能转化：“侧重为农业教育化的机关”，多做“增加生产或预防灾害的工作”。^[19]1934年的《论田赋附加》一文揭露当局“新政”、“建设”带给农民的负担：“这种附税随着新政一天一天的加多。例如办党要钱，办自治要钱，修路修衙门要钱，甚至复兴农村也要钱，这些钱只好尽先向农民要。”“也要在田赋附加上面想法。……在农民看来，新政就是剥削，新政只是剥削二字的另一写法。”^[20]1934年的《故乡（如此山西）》的文章批评说：“七年前的故乡政治当局，正闹着整理村范。甚么推行村政呀？兴办学校呀？以及禁赌，剪发，放足，造林，种树，都有委员常川住县办理。虽然是扰民有余，得不偿失，究竟还要装装门面，一切都像煞有介事似的样子”。这些一窝蜂搞起来的“事业”本来已让百姓招架不住，可官吏们越发无耻，“现在假面具率性不带了，所有的委员，都在督销鸦片，管理食盐，稽查营业税，还有很多的委员征收叫不起名目的税捐。”作者谴责食盐官卖：“现在人民最感病痛的，要算食盐官卖了！在公家没有成立官盐店以前，故乡的盐价是一块现洋买十四五斤，现在只买六七斤了！”作者还揭露官吏垄断地方矿产资源：有一位省里的厅长，虽然已经去职，可仍然一手遮天，其胞弟“武断乡曲，为所欲为！全县的煤矿，都被他一手垄断了，几万人家的烧煤，要比较公平价值多受一倍的剥削！官盐店也是他经理着！”

当年土匪为害许多地方，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受害者不仅有普通的农民，还包括农村的地主。《农村地主与都市贫民》的作者写道：“是1930年，土匪是这样多，小股十个八个人一伙的潜伏在村镇里，大股一二百人一伙的占据着几个大的村庄。小股在夜间暗进明出的抢人家的财物，绑抬肉票；大股像征收租税似的向一个一个村庄勒索钱物。假设你拒绝，那便是倾巢来袭击你的村庄；假若你逃避，那便用火来焚烧你整个村庄房舍。我家，父亲母亲是老了，小孩子又多，与匪患抗拒自然是那样力量的。昼归夜出的逃避，在这样状态下，又是非常难非常苦的事情。于是经全家几度会商之后，便忍痛把家产托旁人照管，全家搬到城里去逃避这灾难。”^[21]显然，土匪之患，已成为农村发展生产的一大阻碍。除了土匪之患，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尤其军阀之间的战争，也形成了严重的骚扰。张培刚撰文揭露说：“凡兵匪过一地，驻一地，则见树木被砍伐殆尽，桥梁堤岸被拆毁无遗，至一遇战争，则整个乡村为之荡然，尽成灰烬。……拉夫或拉差，在农闲时，犹有可说，至于农忙时，则荒芜田地，为害甚大。”^[22]

《独立评论》在探讨农民贫困原因的时候，还注意到了人口过多的因素。巫宝三在1934年的《乡村人口问题》文章中指出：无论是以国土人口密度还是以农业区人口密度衡量，中国的人口数量都显得明显高于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口如此之多呢？他认为“中国一向有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崇拜——乡村特别厉害，所以早婚与生育众多的特点，在世界各国除印度外，就要算中国了。河北省南部，男子十二三岁结婚，并不是稀罕的事。他们的打算，是早早娶一个媳妇

回家,家里可以多一个人劳作。其实媳妇劳作的结果,是否够她食用消费,很成问题(国人不从劳作的效率的增加上着想,而从劳作人数上打算,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至于过几年生下一大群小孩,更是不用说了。”关于农业人口众多与贫困的关系,巫宝三认为“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家无‘担储之粮’”,“人无‘剩余之劳’”,自然逢到旱涝就会出现饥荒。^[23]吴景超在1935年的《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一文中则认为,农民人数过多,直接导致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他说: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是148英亩,英国为74英亩,而中国不过3英亩。他引述美国政府专家的话:中国北方一般农家平均有地不过4英亩,此种规模“是一家人用他们那种农具所能耕种的最大限度了”,但所能生产的粮食不过28蒲式耳(1蒲式耳合小麦60磅),仅够2个人食用一年;而美国的一户农家使用机械,可耕种1000英亩,生产出7000蒲式耳小麦,可供500人食用一年。^[24]中国由于农业贫困人口众多,无力投资购买先进的农业器械,只能维持落后的耕种方式,故不可能生产出较多的农产品,也就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吴景超在1936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指出人口过多的危害:“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25]何廉撰文《中国农业生产要素之概况》,认为中国农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约农业:“盖所谓集约者,只能自每亩所用之人力耳,农器之设备,及耕种之科学方法,则尚未足以言集约。……吾国之农业,实为资本不足人力过用。”^[26]应该说,作者们对农民数量过多及其导致的问题的认识,是有见地和符合实际的。

《独立评论》还较多地探讨了土地问题。吴景超在1935年撰文《耕者何时有其田》呼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国没有田的农民以及虽有田而不够的农民,仍占全民二分之一以上,这个问题诚是人民生活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发的,可是国民政府已经成立若干年,对于如何实行孙中山先生遗教的这一部分,竟丝毫没有表现,未免令人感觉失望了。”^[27]出于对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关切,吴景超等学者还于1935年10月前往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对阎主张的土地村公有制度进行了实地考察。阎的主张是:村公所发行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对年龄在18岁至58岁的农民,计口授予份地,视情况变化,在适当时候进行份地的重新划分。吴景超就考察的结果撰写并发表了《阎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吴说,他们去山西之前,即对那里的土地主张抱有若干疑问。这些疑问主要有:山西现有农户平均拥有耕地是32亩,据测算实行村公有后,每个农民可分得31亩。这样的小规模占有土地,对提高生产力来说没有积极意义;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所有权,他们是否愿意;随着人口的必然增加,每人所得土地将减少,农民生活会受影响,但改革设想中并未提出相应的保障办法。吴景超等人向阎询问,“但他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认为已经解释了我的疑虑。”吴景超认为,计口授田在俄国和古代中国都曾实行过,也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希望阎先生在实行他的土地政策以前,要知道以前别人的失败,原因在于何处,以免再蹈历史上的覆辙。”阎锡山告诉吴景超等人,在回答张学良关于实行土地村公有政策要杀多少人时,他说“并不准备杀一个人”。吴景超在文章中表示:“我们愿意大家都留心来看山西这种和平革命。”^[28]吴景超的文章反映了作者对土地制度变革的关心,他对阎氏主张的疑虑也是清醒的,对